权利咨文：公民目击者记录人权

使用#StateOfRights 通过推特继续对话

谷歌+ 环聊
华盛顿
2015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三

马汉提先生：根据你们在世界各个不的地点，各位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欢迎参加今天的**“权利咨文”**活动。我叫丹·马汉提。我是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的高级顾问。我非常有幸担任今天讨论的主持人。我首先要感谢每一位主讲人的参加，我一会儿要介绍他们，但是我要特别欢迎世界各地所有在线上参加的人，尤其是能够在我们驻海外各国大使馆参加的人。我还要特别欢迎前助理国务卿麦克·波斯纳，他将从纽约大学商学院商业与人权中心参加我们的活动。

今天上午，我开始时要问每一位主讲人一些问题，然后我会直奔主题，开始从推特接受你们的问题。在这个房间里就有一个小组在监控推特的运行。那些在推特世界上的人，请用主题标签#StateofRights 随时提出问题。我们这个小组会把问题实时传给我。今天活动的其它资料可以在本活动的数字档案 humanrights.gov/stateofrights 中获得，这次活动也正在上面直播。

我先来介绍一点这个系列活动“权利咨文”的背景。“权利咨文”是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负责的公共外交项目。这个系列活动将专家和公民聚集起来，就影响新兴强国和羽毛未丰的民主国家的全球趋势进行互动式对话。使用推特主题标签#StateofRights，网上的观众可以而且已经参加了具有全球重要性的政策讨论和辩论，就像今天这样，就是记录人权，并且在活动结束后继续网上和相互之间的对话。“权利咨文”系列的每一个活动都将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存档，以便让公民社会组织和其他人很容易下载这个（听不清）在他们自己的网站刊登。

那么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讨论。我们今天的题目涉及公民目击者记录人权。我们要集中讨论视频在记录和认识践踏和侵犯人权状况过程中越来越大的作用，以及公民、社区媒体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它非传统记者正在从事的有创意的工作，揭露践踏人权的状况（听不清）。

在我们深入讨论之前，我想介绍我们今天的参加人。我们有麦德琳·拜尔，她是人权频道“目击者”的项目经理。她也是帮助我们组织这场活动的伙伴组织。所以，谢谢，麦德琳。

拜尔女士：谢谢！

马汉提先生：谢谢。我们有克里斯多夫·科特尔，国际特赦组织危机反应顾问。有艾琳·赫莱拉，她的身份包括委内瑞拉电影制作人、记者、教育家和委内瑞拉视频的联合创始人。

各位可以在 humanrights.gov 上看到他们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自传和推特地址，有很多有关他们、与他们相关的资料。如果我们今天在讨论结束以后还有时间，我会看看能否请他们谈谈他们在网上为世界各地人权组织和公民视频记者准备的一些资源。

说了这些，我们马上进入主题。昨天晚上我阅读了《人权频道年度回顾》，它让人看到一个事实：在去年，视频和业余摄影者用手机和其它设备拍摄的视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抓住了公众的注意力，提高了人们对各种事件的了解，而且经常把一些问题提高到全球水平。我们看到有关践踏和违反人权的视频，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美国密苏里州佛格森，在（开罗）解放广场，在伊拉克有关“伊斯兰国”。视频的确抓住了成百上千万人的注意力。越来越多的事件被视频拍到，越来越多的人在人权工作中使用视频。

我想就这个问题从“目击者”开始讨论，向麦德琳提出一个问题：除了我提到的你在“目击者”的《年度回顾》开始时强调的高调事件以外，你能不能谈谈一两个例子，就是一般——所谓一般公民或者普通公民记录了践踏行为，或者让有关当局、新闻界、或者国际大众注意到问题，从而引发变化的？也许你可以谈谈这一点？

拜尔女士：当然，而且谢谢你的这个问题，丹。全世界每一天都有这种例子，我们看到，每分钟有 120 个小时的视频上传到 YouTube，在那些视频里就有这种捕捉到践踏人权的视频。我只举两个我们最近一直在追踪的例子。一个来自巴西。就在上个月，宪兵突袭了里约热内卢的一个贫民窟。在这次行动中，一个 15 岁男孩被开枪打死，一个 19 岁孩子受了重伤。当局的官方声明说，发生死亡和受伤是因为警察受到武装罪犯的袭击，他们袭击了警车。然而事发几天之后，出现了一段视频，事实上是被开枪打死的那个 15 岁男孩在突袭中拍摄的，清楚地显示他和他的朋友在大街上闲逛，什么也没做，就是相互讲笑话，警察就开始追他们。

这段视频一出来，当局马上就收回了他们最初的声明。他们对 9 个涉案警察展开调查，事实上，这些警察的指挥官在调查期间被调离岗位。关键是，这些警察有最高的比例——巴西是世界上警察践踏人权比例最高的国家，然而在发生法外杀人时，我们一般看不到这种对当局采取的措施。所以这只是发生在几个星期前，我们在调查过程中观察到的一个例子。

另一个例子来自乌克兰。就在去年，人们知道的“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抓住了世界各国的注意力，部分原因是抗议者自己现场直播和拍摄的视频，紧急救护人员和记者拍摄的视频。在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中有 100 多人死亡，许多人权研究人员说，已经构成反人类罪。我实际上昨天还和一个在乌克兰的人权研究人员谈过话，她正在整理数以百计“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抗议活动的视频。她对我说：“你知道吗，很具有讽刺意味。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多视频记录这种践踏权利的情况，但是我们仍然没有看到伸张正义，没有看到对于那些视频中显示的践踏人权的情况进行有意义的调查。”

这就是问题所在，尽管记录这种当局和犯罪分子践踏权利的能力比任何时候都强，仅仅有视频并不见得就会伸张正义，或者把那些视频用作司法程序中的证据。

马汉提先生：所以我想接着这个，我是否可以问一个相关问题。我是说，你会给什么样的忠告，或者你如何了解应该怎么样才能使一段视频的价值从提高人们对各种问题的意识，尤其是有那么多视频，上升到能够在变化过程中真正有效地使用这种视频，或者鼓励问责，或者伸张正义？

拜尔女士：当然。要通过一系列方法，而且有一系列步骤伸张正义，在这个进程中，视频可以真正推动变化。一个恰好就是让媒体注意这个问题，我想这是你提到的一个事情，密苏里州佛格森。由于当地居民拍摄了抗议的视频，拍摄了同警察冲突的视频，美国那个城市里的警察践踏权利的情况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促使进行调查的部分原因，也是导致我们将看到的改革建议的出现。

还有其它例子，人们拍摄了具体的践踏权利的视频，期望那段视频用于法律程序中，但是有很多障碍——妨碍实现这种情况。我们“目击者”努力的一件事就是向拍摄的人提供在现场拍摄视频和信息的技巧，以便那段视频可以用于司法程序中。

那么这包括捕捉到上下文，捕捉到地点，确保在拍视频时收集到足够的信息，以便人们看到它时，有时是多年以后，他们能真正了解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遇到的另一个挑战是，在司法程序中，视频的真实性常常受到质疑。我们看到 2010 年在牙买加拍摄的一段视频。这又是一个法外杀害一个没有武器的人的案子。这个人倒在地上，被一个警察打死。被人用手机拍下来了，引起牙买加媒体的注意。但是几年以后那个警察受到审判时，那段视频根本没用上，一个原因是，检察官说：“啊，我们找不到那个拍视频的人，所以我们无法说那段视频的确是真实的。”所以拍摄的人本身需要了解他们如何能够保留他们的视频，保护储藏链，归档，这样就不是单单放在 YouTube 上，在那里它们是可以消失的。

所以这些只是我们赋予公民力量的几种途径，以便确保他们拍摄的视频，而且常常是自己冒着危险拍摄的视频，可以用于司法程序。

马汉提先生：这实际上是转入另一个我想提起的对话题目的绝好过渡，就是这个核实真实性的挑战。我的意思是，说到底，人权纪录一直都面对这种挑战，不管是报道的写作还是其它视频形式，媒介形式。所以我想向克里斯多夫问一个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说，在造假或者甚至循环使用旧视频的风气下，为了有效利用视频而面临的核实真实性的挑战，首先，可能采取什么措施对抗造假视频或者循环使用旧视频的风气，有任何措施吗？其次，根据你的经验和你做过的大量工作，你认为现存有哪些技术手段或者可能创造的技术手段使人们能够更彻底地核实视频的真实性，使其更能经受住检验？

科特尔先生：好。我觉得这的确是我们所有人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不仅是人权调查人员，而且是记者或者政府官员，每天都会遇到，我想麦德琳刚才对这种来自我们的电邮和网站的新内容解释得非常好。这里的问题是，有很多人只是转帖内容，或者在罕见的情况下，我认为，实际上是发了假视频或者假图像。这或多或少是个问题。我认为最大的问题

实际上是循环使用上传内容。我们可以列出很多例子，看到视频或者照片实际上很旧，或者干脆就是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

所以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应付这个问题。一方面，我认为我们所有的人可以从加强一点最基本的数码知识和核实知识开始。我的意思是，其实非常非常简单。有一些非常简单的工具和技术，我等一下会讲讲，能够让你检查一张照片或者一段视频是否在推特或者 YouTube 上发过，核实一下是否真是新的，是否以前已经发过了。所以每次爆发新的冲突，我认为去年夏天加沙是一个好例子，很多人都在推特上发了实际上是过去冲突的照片，这很容易查出来。不管是经过最基本的训练，还是在这种题目上多阅读点东西，我想我们大家都能学会。

我认为第二个问题，或者说第二个解决办法，当然就是技术以外的，我知道“目击者”做的很多的是你实际上可以跟现场拍摄的人合作，训练他们如何用某种方法拍摄，以便使另一头核实真实性更容易一些，这并不是我们不信任他们。我认为这更多的是我刚才指出的，是有些人真地是故意上传错误的内容。

说到技术解决方法，我认为关键的结论是，并没有一个工具让我们能够核实一份具体的内容，尽管这是个大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回头去查一大堆可以让我们核实内容的工具。我可以在这里列出几个我常用的工具。我在我的推特上发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我知道在这个活动网页上也列了一些资源，所以大家不必做笔记。

在查看内容时，我想我一般都看两个大的方面，非常非常重要。首先，我实际上是看元数据，即使对于网上或者社交媒体上面的内容，这一点也很重要。所以一方面，我们得到越来越多的直接送给我们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实际的元数据。但是有时我们得到的内容来自社交媒体，元数据说明这不是原始材料，而是有人从另外的地方下载的。有几种工具可以检查照片。你具备基本元数据或者（听不清）演示器，例如 Invisor Lite。有一种类似的工具叫做查看视频的 MediaInfo，可以告诉你和这段视频相关的任何种类的元数据。再说一遍，这些资源都发在我的推特上，也在这次活动的网页上。

所以第二方面其实是占了大部分时间，就是进行实际的内容分析。所以你非常非常仔细地观察一段视频的内容，或者一张照片的内容。在看视频时，我放慢视频的速度，把每一个细节都摆出来。我使用一种工具叫做 VLC 播放器，让你能够放慢视频，让你提高视频的亮度等等，非常非常仔细地查看视频中的内容。这就能让我们找到非常具体的地理细节或者非常具体的，比方说，有关施暴者或者视频中其他能看到的人的细节。我们拿到这种细节，然后利用很多现有的开放源代码的工具，例如谷歌提供的谷歌地球。你可以查看卫星图。你就可以核实你用这些工具看到的那种地理细节。还有其它的地图工具，例如 WikiMapia。我利用时区转换器这种工具核实视频或者照片发布的确切时间。

所以我认为这里关键的一点是，有很多、很多的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当然会使工作非常非常麻烦冗长。所以我认为这一点上缺失的绝对是更综合性的工具，既是免费的，也是开放

源代码的，因为其实是有非常昂贵和有专利的鉴定软件，但是对于我这样的人权工作者的工作来说是不现实的。

马汉提先生：好，真是好多的工具。好像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现在，我要请艾琳评论一下克里斯多夫的话，还有，请你用一点时间描述一下，根据你使用视频反映各种不同的社会变化的丰富经验，可不可以请你说一下你的经验，两者结合起来，就会非常好。

赫莱拉女士：好的。是的，我想提到三个要点，这实际上也已经说过了，麦德琳和克里斯多夫已经说过了。但是一点是，上传错误的视频或者利用旧视频一般都有重大影响，一般都会对决定使用旧视频或者伪造视频的特定群体有负面后果或者起到反作用。我们在委内瑞拉看到过这种情况，有人发了一个造假视频。这个视频不是委内瑞拉的。我们在去年2014年的骚乱中看到过这段视频。后来显然政府利用这段造假视频来抹杀所有其它可能是真实的视频内容的真实性。

所以一般来说，现场的活动人士或者人必须非常注意这种日后可能会出现的效果，注意这种效果日后会如何产生反作用，并且影响其它内容的可信度。所以必须重视这一点。我认为在各国社会里，当冲突正在发生时，社交媒体知识技巧常常用起来很方便，因为有时有人要鼓动他们的事业，就会转推一段视频什么的，后来发现那段视频不太真实，并不是在同一地点发生的那件事等等。所以这一点变得非常重要。

另外一点是，刚才克里斯多夫提到的数码工具，需要，当然根据我的理解，国际特赦组织和“目击者”都在这样做，就是进行大量沟通，或者与很多数码创造者、发明者进行更多的沟通，看看我们能够如何合作，开发开放源代码的工具和其它种类工具。我们最近在谈这件事，但是，我们的确有图像逆向搜索引擎，我们可以看到用过这个图像的其它地方，看到过去在哪里、什么环境下使用过它们。但是视频的这种逆向搜索引擎还没有，所以就有点困难。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小图标来找，有时对整个视频逆向搜索还是挺难的。

所以还是这句话，要和愿意帮助开发这种工具的数码公司密切合作，这是关键。

马汉提先生：听上去好像是非常棒的工具。你是说这是现有技术，还是说这是我们能够期待出现的某种图像逆向搜索引擎呢？

赫莱拉女士：这个，视频逆向搜索引擎，目前来看，好像有一些人已经想到它了，似乎是在设计阶段，也许，谁知道，我们可能很快会看到这种东西开发出来，希望如此。

科特尔先生：我想快快说几句。就是再一次，再一次强调逆向图像搜索，照片逆向搜索已经有了，就是我在说核实知识时的一种非常基本的工具，因为这是一种浏览器的延伸，基本上就是在推特上的一幅照片上按右键，按底下了写着“在谷歌上搜索这个图像”的键，就会给你显示每一个包括这幅照片的网站。所以都是谷歌提供的，由谷歌图像搜索提供。如果到谷歌图像搜索，可以选择上传一幅照片，或者抄写和在这里贴上一个网址（URL）。

几秒钟内，你就可以知道，这张加沙冲突的照片实际上是 2009 年上一次冲突的。所以说这种工具已经存在了。

到现在为止，我知道的对于刚才艾琳提到的 YouTube 或者视频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我们可以抽出视频的小图标，因为当你向 YouTube 上传视频时，就总会产生三幅同样的小图标。所以我们可以利用 YouTube 视频的小图标做同样的逆向图像搜索。这非常非常有效、有用，但还是有很多限制。人们可以自我定制这些小图标，或者你可能漏掉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实际上并不具备强大的工具进行逆向视频搜索。据我所知，并不存在这种工具。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我认为。

和这个相联系，既然我们说到这个话题，我想说一下，我认为第二个挑战是，我们现在说的一切都是我们谈到核实一段视频的一幅单个图像。如果我们有 10 万个叙利亚的视频该怎么办呢？这种缓慢细致的方法显然不行，除非你有两万人帮助你做这件工作，所以这是一个方式。我认为一个更有效率的途径是同电脑科学家合作，使用真正先进的计算技术，至少把视频过滤一下，也许在最后这 10 万个视频里只有 5000 个视频包括一辆坦克。然后你可以找多点人看这 5000 个视频。我认为这是我们仍然面对的第二个挑战。

拜尔女士：我想在这里说几句，倒回去一点，核实现场目击证人和公民拍摄的视频的真实性非常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公民分享视频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脸书、YouTube 这样的社交平台，因为这种方法非常方便和迅速。但是当我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分享视频时，我的原始视频上的大部分元数据被拿掉，然后才在网上分享。所以这种可以用来核实任何视频真实身份的技术是存在的。当我用手机拍照片或者视频时，视频里就有可以核实这段视频是由这件具体的工具在这个地点和时间拍摄的元数据。

所以我们在“目击者”做的就是争取开发出能够让使用者控制元数据并且把它和视频保留在一起的途径，这样我就可以拍一段视频，和国际特赦的克里斯多夫分享，克里斯多夫可以查看这个视频，看到它带着的元数据。所以我们已经开发的一种这样做的工具叫 InformaCam，是“保护人项目”开发的，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我看到还有一种正在开发的工具也来自委内瑞拉，叫做 Photo Ahora*。它用的是同样的工作原理。它能够让抗议现场的活动人士拍照片，然后在推特上分享，一旦在推特上分享，上面就会有一行字，说明这张照片拍摄的地点和时间。

这些是我们正在争取克服这个问题的其它途径，以便真正让公民们有能力记录视频，并且确保视频得到认证，值得信任。但是话说回来，元数据也可以用来使那些拍摄的人、记录的人和活动人士处于危险之中，这也是我们可以讨论的另一个问题。

马汉提先生：对，我实际上希望讨论这个问题。我要看一看推特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进来，以便保持对话。我们首先，大家都谈到各个公司和企业已经开发出来的一些技术。推特上的菲尔有一个问题。他想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有一些在保护人权捍卫者和公民社会空间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企业楷模。也许你可以从技术角度谈谈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们任何人想要多说几句私人领域发挥的作用，我想菲尔会跟感激。

科特尔先生：你先说，麦德琳？我感觉，我不想让你为难，不过我感觉你有话要说。

拜尔女士：我想，我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可以在谷歌环聊活动网页上分享的链接，链接到 Photo Ahora*应用程序。我想，我所看到的公司企业真正在这个领域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是利用它们的技术，并且真正了解他们的技术既可以用来创造条件记录人权状况，又可以用来阻碍记录人权状况。所以我们看到一批公司企业真正采取了重大步骤，确保他们的技术不被用来伤害人权捍卫者，而是对他们有益处。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应用程序 Photo Ahora*，我相信是委内瑞拉的一个拥有技术的市场开发商开发的。它拥有非常迅速开发这种应用程序的技能。

“目击者”还在同 YouTube 合作，管理人权频道上的视频，网址是 youtube.com/humanrights，但是也真地是在教育平台后面的人了解他们的平台正在用来为这种记录提供条件。他们开发的一个工具就是一种能够让使用者模糊面部的工具。所以目前，如果你向 YouTube 上传一段视频，你实际上可以到加强（enhancements）去按模糊面部工具。这个真的重要，因为我们在拍摄抗议或者在采访人权捍卫者时，我们常常要分享他们的故事，让世人知道他们的故事，但是可能也有必要保护他们的隐私，保护他们的安全。这就是这种模糊面部工具背后的理由，是 YouTube 在保护使用它们平台的人权拍摄人员方面真正积极的措施。

我当然也想听到其它的例子。

科特尔先生：我只有一个刚好想到的可能是很小的例子。还是一样，更像是一个有助于核实工作的工具。有个叫 Storify 的公司，更像是一个新闻机构。基本上它是社交媒体领域的美联社。这是一个形容它的好方法。他们为新闻机构核实社交媒体上的内容，要看好多东西，同时也开发很多技术工具帮助他们做那方面的工作。其中有些是有专利的，这个我理解，这也有它的道理。

但是他们偶尔也向公众提供非常简单的工具，其中一个例子是一个名叫 Storyful Multisearch 的网络插件，可以安装在浏览器上。它使你能够在几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同时进行搜索。你可以就某一段社交媒体内容输入一个特有的标识，对整个平台进行搜索，这样你能够看到每一位发布这个具体内容的人。

他们刚刚开始免费提供这个工具。他们在内部使用。现在开放给公众。我认为这是一个私营公司帮助应对核实挑战的好例子。这真的是很棒。我想麦德琳已经讲了不少像谷歌或是推特这样的大公司能够帮助应对这种挑战。我很想看到他们能帮助应对另一项挑战：当把东西上传到网上时，所有的元数据都被修改过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特别是 YouTube，我认为一定可以有这样的选项让人们能做更具体的标签，或者人们可以对已经上传到 YouTube 上的视频做更多的事。你可以标出某些具体事情，或是视频中某个具体的时间点。我认为这都是容易实现的简单技术方案。对于公司来说，更多的是制定的政策决定。

马汉提先生：谢谢。让我看一下。让我们回到网上进来的问题。让我看一下这个。好，这有点让我们的讨论又回到刚才的话题。我们收到安妮在推特上的提问。她不仅想了解公民记者在那里利用视频，同时要了解一个越来越盛行的文化，至少是他们自己配备摄像机和拍摄设备来记录他们自己的互动行为，既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也为了倡导防止这种虐待和倡导问责。她继而问到在巴西、加州、南非和其它地方已经实施的项目。

有没有人可以对此做出评论？你们有没有看到警察机构试图监管他们自己的行为，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拜尔女士：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看到，随着警察部门越来越接受警察摄像机的概念，这显然是一个在美国得到更多解决的问题。我们有一些这位提问者提到的全世界安全部队自己记录他们和平民之间互动的模式。

我最近看到的一个例子是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国防军对待一个少年的视频。军人用军犬滋扰和虐待那名少年。这起事件为人们所知，是因为视频被传到脸书上，又出现在新闻媒体中。在这段视频中，我们看到士兵的头盔上装配着摄像机。尽管以色列的人权活动人士呼吁官方关注这起事件，表示应该进行调查，头盔上的摄像机拍摄的画面从来没有使用过，直到这段视频被泄露到脸书上和新闻里面。

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例子，就是如何能够有更多的视频，但是我们需要确保能够拿到这些视频，公众有渠道知道有什么视频存在，以及我们如何能获得它，否则的话，官方可以播放或不播放这些视频，让大家拿到或不能拿到这些视频。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政府官员自己有越来越多的视频。这些视频如何能被用于曝光官方的和针对官方的虐待行为？

马汉提先生：在我们回到谷歌环聊的问题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们中有没有人见过或是目击过有人想掩盖他们的行为，以避免被摄像机记录下他们犯罪的行为？我的意思是，罪犯本人或是安全机构的行为正在越来越多地被摄像机记录下来。

科特尔先生：如果我对这个问题理解得没错的话，如果有人可能犯下侵犯人权的行为，想把自己隐蔽起来，你看到相机立即产生的效果吗？坦白讲，我一下子想不起来。我想你看到很多的是安全部队或其他人，如果你想想你自己，假如你站在镜头前，你会改变你的行为，你会更紧张，你可能会转过身去。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情况，人们转过身去。他们抬起手来这样做。我想这是我想提到的不同的一点，也往往是被忽视的，因为我们谈到模糊面部。

所以我那样做，我们最近就这样做了。我们有一个尼日利亚的例子，你看到有一个肇事者非常明显地侵犯了人权，因为他们在镜头前进行法外处决人。我们公开这段视频时，我们实际上将行凶者做了面部模糊处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作为人权组织，我们促进法治。所以我们想要确保你看到的那个犯下罪行或侵犯人权行为的人，那个人的身份在一

定程度上也得到保护，因为我们想要推动公正的审判，那个人应该获得公正审判，那个人同样应该享受法定诉讼程序。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即使在我们这一端，我们有时候也采取这类步骤隐藏某些肇事者的身份。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人是谁，我们可能秘密地分享这个信息。如果我们觉得非常有信心，我们可能在一份报告中分享。我们可能和正在调查这起事件的任何机构分享。但是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要只发布视频，而没有足够的背景，或者谴责一个还没有经过公正审判的人。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马汉提先生：我们一会儿可能还有时间回到这个伦理道德的问题，我现在想跳到我们收到的有关安全的问题。不过艾琳，你对于之前的对话还有没有要评论的？

赫莱拉女士：有的。我认为有一件事很多在现场的公民目击者或公民记者必须注意——这个话题我们今年将越来越多地讨论——那就是数码安全和需要做些什么使他们能将资料安全储存。不过还有，以委内瑞拉为例，我们看到一个视频，其中很明显警察想把一个女孩的电话抢走，因为他们知道她拍下了他们在试图抓捕一些学生时做出的不当行为。所以他们明显是要试图抢走他的手机。她大声尖叫，保住了她的电话，但是我们的确看到过一些警察企图抢走电话的情形。

我们还见过另一种情况是，人们在阳台上拍摄被发现，比如警察确切地知道拍摄者是在哪一层，或大概是哪一层，或者是在哪座公寓等等，有时候他们到那些公寓大楼里去。

所以我认为，正像麦德琳刚才也提到一点安全的问题。我认为，随着我们的发展，数码安全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有一些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使用的应用程序，比如Wickr，当你必须销毁——自动或手动销毁信息，使其不会在你的电话上被发现，或者很多时候公民视频的应用程序，以委内瑞拉为例，他们确实通过 WhatsApp 传播出去，所以希望在那个时候，可能有人在你的手机被拿走之前已经得到一份视频副本。因此如果在现场的人能快速传播这个视频，即使是传给一个朋友，或是一个网络，迅速地确保其他人收到这段视频，那么这段视频将有可能被保存下来，即使电话被拿走也不会丢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常看到这类情形。

马汉提先生：这是一个……

拜尔女士：我能不能……

马汉提先生：好，请吧，麦德琳。

拜尔女士：好。只想快速补充一点，艾琳提到的拍摄者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这一点也是我越来越常看到的。活动人士的确肩负起填补空白的责任。在有些情况下，没有新闻工作者在场，或者人权调查人员无法进入那里，那么公民记录一种情况就真的填补了这个空白。

所以传统上，我们预计新闻工作者成为当局的目标，现在我们看到拿出手机的普通民众也成为目标。

这是面部模糊工具的另一个用途，因为出现过好几次不同的情况，抗议者拍下社会运动视频，引起人们的关注，激发起在本国内或国际上的支持。我们看到过政府随后翻脸说："哦，你用视频记录这件事。那么好吧，我们也在看这个视频。"我们看到在伊朗，在叙利亚，在哥伦比亚和许多其他地方，官方向报界展示，在他们的网站上发布，在国家媒体上说："这是活动人士的视频，我们希望公众帮助指认视频中的人。"这对拍摄者和视频中的人都起到了震慑效应。

因此我们看到的一个策略，除了保护人们匿名性的更加复杂的技术外，还有拍摄者从背后拍摄抗议活动，使参与抗议的人不会被暴露身份。我们开始在叙利亚看到这样的做法。叙利亚活动人士因为参与革命而开始成为打击目标，越来越多记录这些事件的视频是从背面或是有策略的方式拍摄的，不会暴露活动人士的身份。

马汉提先生：这正好回答了我们的谷歌环聊中罗恩提出的有关数字和人身安全的问题，因此我很高兴你开始谈到这个问题。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所有主讲人，如果你们有人想多谈一下，是否有任何的建议可能帮助活动人士应对人身和数码安全方面受到的威胁，不仅是在记录过程中，而且是在记录结束后。然后，当他们把资料传给人权组织或其他人，应该采取哪些安全防范来在某种程度上保护媒体？

有没有人愿意评论？克里斯多夫-

科特尔先生：当然。或许我有一件具体的事要说，因为我知道其他人在这个问题上也会有更多的观点。我认为一个巨大的挑战是，当然如果你拍摄，或者你是一个人权捍卫者，一名活动人士，一位置身于非常不安全、充满敌意环境中的公民记者。你用手机，或许只是一台简单的相机记录违反人权的行为或者一个具体的犯罪行为，你在记录这个，你手上就握有这份具体的记录，你有具体的内容，但同时你身上也带着所有联络人的信息。所以如果有人，如果官方拿走了你的手机，得到了你所有的联络人，获得了你所有的内容，那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信息。因此那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风险。

所以当然问题是，有没有方法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有一些在 InformaCam 基础上研发的应用程序，和 InformaCam 类似，麦德琳或许可以谈谈它的功能是否也和 InformaCam 一样。International Evidence Locker 这类工具和目击者应用程序可以拍摄一张照片或一段视频，然后马上从你的手机上发送出去，因此不会在你的电话上留下任何痕迹。所以我认为这是在保护方面的一个重大进步，因为如果你的手机被官方拿走了，你的电话上不会有任何内容。你可以用一个非常……比方说一部没有存储任何你的联络人的空白手机，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我认为，我所看到的正在保护方面发生的真正进步。

马汉提先生：你是否想根据你的经验补充什么，你处理过这些问题，并且只制作了一批视频……

拜尔女士：当然。是的，我认为克里斯多夫提到的好极了。现在有一系列工具和技术，活动人士每天都需要学习，因为每次活动人士和新闻工作者开发出方法来保护他们的数据，那些想获得他们数据的人就会开发出更加老练的方法。所以技术在不断地变化，这是活动人士需要知道的。我们在“目击者”培训人权捍卫者时总是强调，要清楚他们面临的风险，他们自己的风险，以及给他们的拍摄对象带来的风险。

有时候，活动人士愿意冒那些风险，但是如果他们愿意，特别是他们冒着风险去拍摄，那么确保储存好和保护好他们拍摄的东西就更加重要。所以不论是使用隐私手机、加密电子邮件、给硬盘加密，活动人士采取的所有这类保护他们技术的步骤，都在我们培训活动人士的内容范围之内。

就 InformaCam 而言，这正是 InformaCam 的元素之一，因为尽管它的确加入了元数据以提高你的视频的证据价值，但同时也把这个元数据嵌入和加密，因为我们知道，可以通过他们使用的工具来准确判定他们的位置或者他们的身份，这可能将拍摄者置于风险之中。

所以尽管我们非常希望使用者或平台透露元数据，来帮助我们核实视频的真实性，我们也需要让用户能够控制那个元数据，确保他们知道元数据可能使他们处于风险之中。所以不论是给那个元数据加密，只提供给预定对象，还是让用户控制谁可以看到这个元数据，这些是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

马汉提先生：我只想从那里接下去再回到更广义的伦理问题。我们，你们中有几个人提到了将人的面部模糊以保护当事人身份的技术，但是当公众利益处于危难关头，人权组织在推进一项人权问题，拥护者使用视频，如何决定以及谁来决定一个视频中哪些是应该被看到，哪些是不应该被看到的，不管是在公众面前，还是被安全组织或是司法（听不清）本身看到？这些决定是如何做出的？

科特尔先生：我想，也许我先说说这个。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我们在记录和研究侵犯人权问题已经做了 50 多年的工作。所以很多这些担忧并不是新出现的，这种形式当然是新的。所以我们总是，50 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我们访问的那些个人会存在哪些风险。很多情况下，我们在采访时改变这些人的名字，发表一份证词保护他们。所以问题是，我们如何将这类挑战和风险转入数字时代？

现在有一些工具，是的，正如我们讨论过的，比如面部模糊或者也许我们不显示某个视频。但是我们一定要对我们发布的东西非常非常小心。我们是否将某些面孔做模糊处理？这段视频是否会让一个人处于风险之中或者处于某种可能会给这个人带来麻烦的境地？因此我们有我们的内部流程，我们必须对我们发布出去的任何内容做适当的风险评估。我认为这不会因为新的内容而发生改变。我认为挑战是视频和照片中有我们以前没有的很多看得到的细节，所以这会带来一些更多的挑战。我们知道互联网上有很多内容，我们无法获得图片中所见的人的知情同意。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必须，我们有时候仍然会想发布这些，因为让全世界看到它是重要的，但是我们要想到我们是否会让在视频中露面的人处于风险之中。所以是的，我认为这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每天都十分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

马汉提先生：太好了。

拜尔女士：是的，快速补充一点，我是说，目前真正的问题所在常常是视频平台，YouTube 和推特这样的网上平台，它们是公司，而不是向国际特赦组织这样的有 50 年经验的人权组织，往往是他们自己的政策来决定什么样的视频可以留在网上让世人看到，让人权调查者或者新闻工作者找到。回到我昨天和乌克兰人权研究人员的谈话，看着几百条来自“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抗议的视频，其中很多在 YouTube 平台上已经没有了，因为各种各样的政策原因，有时是因为它们触犯了对有关画面内容的政策，有时是因为版权问题，还有时是因为政府出于某种原因要求 YouTube 撤下视频。

所以这些事都是这些平台需要知道的，因为虽然某些视频可能不适合公众使用，可能会煽动仇恨，可能会使视频中的一些人陷于风险之中或成为受害者，这些视频也能有证据价值，并且对于我们这些监督和研究侵犯人权的人士来说有关键作用。因此我们目前就这些平台所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对于那些可能违反某些公司政策的视频，我们如何确保视频被妥善存档以供需要那类视频的适当观众观看。

马汉提先生：这的确很有帮助。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事实上我们只有时间回答一个问题，然后做总结发言。但我要这样做，我们事实上有两个问题进来，所以我要把两个问题都提出来，给你们所有人一个机会回答两个问题中的一个，这取决于你认为你在哪个问题上有更多的经验和更深入的看法。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和之前的私营部门的讨论相关的。问题是：科技公司和其它公司应该做些什么让活动人士能得到一些电子安全工具，它们是否已经可以得到了？”还有一个问题，不同但也非常有趣：“如何将视频和其它技术用于记录更微妙的侵害，比如腐败？”

好，我抛出这两个问题，我要让你们每个人依次回答你想回答的问题。让我们从艾琳开始，因为我认为所有其它问题你都是最后回答的。所以艾琳，你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有什么评论吗？

赫莱拉女士：有的。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很有意思，但是我需要更多时间来想一下。我认为说到如何做，我们（听不清）有点进入调查新闻的领域，看到这些不明显的侵害行为如何被记录下来的工作流程是很有意思的。也许这和，可能这些证据不是特别明显，因为你并不拍摄那些真正正在发生的东西等等。所以这需要，啊，这件事我必须再多想一下，因为你必须发明出一个工作流程或是一种程序，不管你在镜头前说什么都可以被证实，或者可能是真的，从这一点出发，获得其他人的注意，调查具体案子。所以……

马汉提先生：我认为（听不清）这本身就对这件事有所帮助，所以如果你有更多需要阐述的，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发布在网站上。但是因为我们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以克里斯多夫的发言开始，麦德琳的发言结束，然后我会做一些总结性的发言，我们今天早上就结束了。

科特尔先生：没问题，那么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好了。我认为目前已经有很多数码安全工具。我认为有两件重要的事，第一，它们应该对于那些在前线的人有真正的用途。有时候我看到非常非常精美的应用程序和工具，但是不是全世界每个地方都能用，他们更多是为西方世界研发的。所以这个一般来说很重要。

但是我认为，特别是对科技公司来说，我认为，我不是一个数码安全专家，但是我认为数码安全工具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它们非常透明，使用非常开放的源代码。乍一听起来这可能有点违背常理，但因为它们是开放的源代码，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测试它们，可以找到其中的漏洞，你可以做安全审计，找出某个软件存在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任何一家从事数码安全的科技公司对于自己的产品必须非常透明、非常公开，这样才会，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将使它们最终会安全得多。因此我认为，科技公司在这一点上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否则的话，它们卖给你一件不是非常透明的产品，两年以后发现这个产品是完全不安全的。

马汉提先生：这很有帮助。谢谢。麦德琳，最后发言的机会留给你。

拜尔女士：谢谢。首先我要表示非常支持克里斯多夫的建议。我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因为我认为这十分重要，你提到的这一点，用摄像机拍下一名警察殴打一名抗议者或者水桶炸弹要容易得多。那是非常激烈的画面，也容易拍到。但是对一个普通公民来说，用摄像机拍下正在发生的可能没有那么激烈的，可能没有一个可以记录的具体事件的侵害人权行为则要难得多。

我想举一个印度的例子，叫“视频志愿者”。这个组织为社区记者提供设备并对他们进行培训，教授他们如何讲述发生在他们自己社区内的人权问题的故事。他们涉及的问题从他们的社区缺乏饮用水，到地方学校没有任何课本和用电，再到对妇女或达利特社区的硫酸袭击。他们制作成非常短的视频报导，最终赋予他们的观众可以实现变革的行动力，如果被这些视频打动，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给他们一个电话号码，可以同特定的代表联络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有相当多的成功的事例。

所以我想这也又回到你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视频如何能促进变革。“视频志愿者”的方式是通过非常有针对性的问题，富于行动的视频，真正赋予观众们参与的力量 。

马汉提先生：非常谢谢你。我要违反我自己的规则了。艾琳，如果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因为我在一开始就为难你，你现在也可以为难我，或者我们可以直接把一些东西放到网上作为今天的结论。所以如果你有什么要补充的，我们现在欢迎你来讲。

赫莱拉女士：好的。我熟悉“视频志愿者”所做的工作，也同意麦德琳的意见。我能想到的一点显然是如何采访，那些可能是微妙的、不那么明显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所以“目击者”的确有那些资料，比如如何采访那些可能被侵害或者是强奸受害者的妇女等等等等。

所以其中之一是开发更好的工具，真正理解该如何采访那些这类不那么明显的侵害人权行为的受害者，也许我们看不到他们，但这赋予了他们可以讲述这些故事的平台和声音。

马汉提先生：那真是太好了。但是很遗憾，至少对我来说很遗憾，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想再次感谢我们今天三位非常出色的主讲人，克里斯多夫·科特尔、艾琳·赫莱拉和麦德琳·拜尔。非常感谢你们。所有的主讲人都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可以使用的资源，很多我们今天都讨论过了。我们将把这些放到我们的资源网站 humanrights.gov 上，或者至少我们会放上链接，还有我们今天三位客人的推特账号。我们也会请他们将今天提到的任何他们认为值得强调的内容以推文的形式发送出去，使用#StateOfRights 的标签，这样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看它们。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今天的谷歌环聊内容将会以存档的形式放在 humanrights.gov 网站上。这个活动以后，这个网站会有很多人浏览。所以我们很期待真正将这个视频传播出去。我认为这是真正有成效的。我学到了很多。外面有很多资源。所以非常感谢每一位参加者，感谢同我在这里的帮助实现这次环聊的国务院团队。

谢谢各位，希望参与环聊的世界各地的每个人都有愉快的一天。

科特尔先生：谢谢。

拜尔女士： 谢谢。

赫莱拉先生：谢谢。